



文学卷 ②②

总主编 / 卞孝萱  
本卷主编 / 于景祥

翰海文澜

历代文学典籍略说

● 王树森 著



辽海出版社

中华文化百科·文学卷②

# 瀚海文澜——历代文学典籍略说

王树森 著

辽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瀚海文澜:历代文学典籍略说/王树森著.-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1.1

(中华文化百科, 22. 文学卷/于景祥主编)

ISBN 7-80649-993-8

I. 瀚… II. 王… III. 古典文学-作品-简介-中国

IV.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847 号

# 总 序

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文物古迹，在科技上有许多重要的创造发明。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将近 4000 年。从秦、汉时起，中国就是统一的国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分裂是变态的，而统一是正常的。这表现在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中国是一个拥有近 1000 万平方公里的伟大国家。

中国是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为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的统一、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现在，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和衷共济，中华民族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情感广泛渗透于哲学思想、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心理素质、社会观念、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之中。因爱国主义而集合了民族凝聚力，焕发了全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青少年要抓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遵照这一指示，辽海出版社组织编写了大型丛书《中华文化百科》。这套丛书分为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综合6卷，共100册，每册10万字左右。参加写作的，有年逾花甲的教授，也有风华正茂的博士、硕士，是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读者对象主要是大学和中学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各界人士。因此，内容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立足于知识性和可读性，兼顾到理论性和学术性。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依据原始资料外，又吸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爱国主义是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对此，要普遍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出版《中华文化百科》就是面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形式。这套丛书，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了解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了解先辈们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过去，有助于理解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努力使这套丛书成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读物，感染熏陶，潜移默化，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培养爱国主义感情，提高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觉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提高自身文化素质。

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文化，是新世纪的伟大工程。我们全体编者、作者有幸能为这一工程尽微薄之力，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快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指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编者

2001年3月

# 目 录

总序 .....	1
引言 .....	1
一、古代典籍简说 .....	1
二、古代文学典籍的分布 .....	10
三、经部中的文学典籍 .....	18
四、史部中的文学典籍 .....	32
五、子部中的文学典籍 .....	46
六、诗文总集 .....	57
七、诗文别集 .....	84
八、小说总集 .....	122
九、小说别集 .....	131
十、戏曲总集 .....	162
十一、戏曲别集 .....	168
十二、文学评论 .....	182

## 引言

中国古代文学典籍是中国古代图书的一部分，它们形象地记录着中华民族从远古到近代征服自然、认识社会、创造文化成果。攀登人生境界高峰的奋斗历程，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瑰宝，内容广博，形式多彩，蕴涵深邃，影响深远。在即将跨入 21 世纪的历史时刻，向未来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主力军——青年一代介绍这份珍贵文化遗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在向青年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典籍时，既没有按照我国古代历史的发展线索从先秦到清代介绍各个时期的文学著作，也没有按照现行的文学分类罗列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而是从古代典籍谈起，按照古代图书的四部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部介绍常见的、重要的古代文学典籍。这样做，除了向青年读者提供一些有关古代书籍的起源、分类、流传、亡佚等文献学的粗浅知识，更为主要的意图是，把古代文学典籍放在古代图书的大系统中来介绍，有助于展现古代文学典籍流传的实际情况，有助于说明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内在的深刻联系，因此有助于青年读者在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中把握古代文学典籍的精神蕴涵和艺术风貌。

为此，本书第一节简述古代典籍的产生、分类、流传，作为开端；第二节对古代文学典籍分布于经史子集四部的情况作了一定的理论说明，主要是从传统思维的直觉性、形象性特点



来说明议论文章、理论著作、历史著述也在广泛地应用比喻、象征、寓言，在叙事说理中有形象描写，甚至情感抒发，致使某些哲学著作、历史撰述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第三节至第五节分别就经部、史部、子部中的重要文学典籍作了简要介绍。第六节至第十一节则介绍集部中的文学著作。集部中的书籍比较复杂。有的是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的汇编，称为总集；绝大多数是历代文人著作的结集，称为别集。在同一别集中，有诗文、词曲、辞赋等不同体裁的作品，也还有政论文章和学术著作。为了便于读者，我们结合现代通行的文学分类，分诗文总集、诗文别集、小说总集、小说别集、戏曲总集、戏曲别集，加以介绍。最后设文学评论一节，介绍几部重要的、有影响的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这样介绍，结构有些失衡，文字多寡不均。但在我们看来，这样似乎更符合古代文学典籍的实际情况。只得如此，或者说不得已而为之。

对每部文学典籍的介绍，对别集的作者生年、总集的编纂过程，只作简要叙述，重点是评述其思想和艺术上独特成就和历史贡献。末附该书的通行本、标注本或译释本，以便读者参阅。

## 一、古代典籍简说

本书向读者介绍的古代文学典籍是一个历史学概念。我国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进入近代社会。因此，古代文学典籍主要指形成于 1840 年以前的文学书籍。考虑到中国古代文学典籍分布的复杂性，在介绍文学典籍之前，首先向读者简要交待我国古代典籍产生、分类和流传的一般情况。

典籍，即古代图书的总称，今天称为书籍。相传唐尧、虞舜时代就有书籍，实不可信。书籍的出现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一是社会生活日趋繁复，有些事实、道理、情感需要记录下来，以备后人查阅；二是有了初步可用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现存的殷商甲骨文只是以占卜为目的的记事片断，还不能算做正式书籍。古书上记载，西周时期已有了系统记录周文王、周武王治国之道的书籍，称做“方策”。这是因书写材料而得名。古人用来写书的材料，有的用竹片，叫做简或策；有的用木板，叫做方或牍。竹简仅能写一行字，用来书写简短的内容；木板能写数行字，用来写较多的内容。制成竹简或木板的方法是，先取竹、木，截成八寸至二尺四寸之间的短段；再割成一定厚度的片，削平，成为长方形的写书板。新的竹简要先在火上烘出水来，叫做“汗青”。然后用刀刻字。每块书板上刻的字数不定，通常是在二十二字到二十五字之间。因此，一篇文字要用很多的竹简或木板刻写，刻成之后必须用牛皮条或丝绳按文字的次序编连起来，成为一册书。从字形看“册”

字，就是编起来的书板；“典”字就是把一册书置放在放书的木几上，以示重要。

我国现存最早的典籍是相传由孔子编写的五经：《诗》、《书》、《易》、《礼》和《春秋》。其中只有《春秋》是孔子根据春秋时期鲁国史料撰写的一部编年史纲要。其余四部均为周王朝保存的各种文献资料的编纂。从时间说，这四部书约编定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时。上述情况说明，古代人最初没有著书观念，只是随时用文字把一事实记录下来、一个道理说情楚、一种情绪抒发出来，形成片断的文字材料。后来，这类文字材料积累多了，才把它们分门别类编在一起，就成了书籍。我国古代崇古意识很强，尊重古人的记录。儒家创始人孔子就奉行“述而不作”的原则，只记录、编纂古人的言论而不发表自己的创见。从这个情况看，可以说古代典籍始于编述，而不是始于著作。所谓编述，就是在已有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按照一定的体例编成一定形式的书籍，如孔子编的《春秋》。这部书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料，按照年月日简要记录鲁国史实，同时兼记其他诸侯国的事件，以表达孔子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看法。。所谓著作，是指在记事、说理、抒情等某一方面有创造性的书籍。我们可以说这是作而不述。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春秋末年东周王朝掌管文献资料的史官老聃知识渊博，见解深刻。他看到春秋末年的社会巨变，王朝内阍，便弃官西出函谷关。当时的守关人尹喜要求老聃把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用文字表述出来。于是，老聃写了约五千字的哲理韵文。这就是被后人称为“道德经”或“五千言”的《老子》。我们可以说，老聃是我国最早的著作家，《老子》书是我国第一部著作。

到了战国时期，由老聃开始的个人著作逐渐成为时代风

气。一部部具有独创性的著作不断出现。记事的有左丘明的《左氏春秋》（西汉后期称《左传》）；说理的有《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抒情的有屈原的长诗《离骚》、《天问》和组诗《九歌》。出现如此众多的著作，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了较强的创作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和普遍，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西周时期，《诗》、《书》、《易》、《礼》等文化典籍的原始资料均由周王朝的文化官员专事掌管，庶民与文化教育几乎无涉。这种文化学术被贵族垄断的局面，古人称为“学在官府”。春秋末年至战国期间，生产工具有了改进，制作铁器，使用牛耕；因之，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生产关系由原来的奴隶主所有制逐渐向封建地主所有制过渡，阶级关系复杂，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周王朝的权力进一步衰落。因而，原来由周王朝保存的文化典籍和文化官员流散到民间，结束了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由此可见，战国期间，古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文化普及的历史局面。

于是，出现了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士。士阶层的来源有二：其一是奴隶制时代的贵族。他们受过教育，掌握文化知识，具有独立于社会舞台的能力；但在社会巨变中，有的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地位，只好依靠自己的文化知识独立谋生，沦为知识分子。其二是庶人，即平民。他们原来的社会地位低下，却凭借着社会变革的时机，掌握了文化知识，在列国纷争的政治环境中，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活跃于政治舞台和学术领域。新的知识阶层的出现，给中国古代文化带来了巨大变化：思想活跃，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著作迭出。从此开始了中国书籍史上以著作为主流的新时期。这里所说的“以著作为主流”并不意味着编述的书籍在数量上较少，也不意味着编述形式失去其重要意义。恰恰相反，现在传世的许多书籍很多是编

述结集的，很多具有独创性的各类著作是由原作者的门人、后学或后世学者编纂成书的。正是因为历代作者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以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了叙事、说理、抒情等不同门类的书籍，才直接地推动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不断发展，创造出战国期间学术繁荣、书籍众多的新局面。

然而，这种文化繁荣的新局面却遭到了秦王朝焚书政策的严重摧残。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一方面对人民实行残酷的暴力镇压，另一方面推行文化摧残政策。秦始皇三十四（前 213）年，下令将民间收藏的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之言尽行烧毁，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免遭秦火。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建立起来的汉王朝，以秦为鉴，认识到以武力可以征服天下，却不能以武力治理天下，于是改弦更张，采用文武并用的长治之术。汉武帝时期，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大兴礼乐教化、独尊儒术，在朝廷设五经博士，鼓励知识分子著述，弘扬儒家学说；同时派出朝廷官员大力搜求民间藏书。至西汉成帝时，汉王朝的宫中藏书颇多且从未整理。于是成帝令汉室宗亲博学多才的刘向负责整理宫中藏书。刘向每整理一部书就写出该书的基内本容上奏成帝。前后近二十年，未能完成整理工作即辞世。至汉哀帝时，又令刘向之子刘歆继续整理。刘歆完成了图书整理工作。他把皇家图书按内容、性质分为六大类：“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每类图书有个概括介绍，称为《略》；六略之前有综述图书源流的总论，称《辑略》，合称《七略》。《七略》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图书目录著作，具有创始奠基的意义。其中的图书六分法更是一个创举。可惜，《七略》已经亡佚，所幸、东汉班固写《汉书·艺文志》完全按照《七略》的六分法著录当时的图书。今天、我们可以根据《汉

书·艺文志》来考知当时图书分类的情形。

(一) 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等。其中。前六种是儒家学派传习的经典。也称《六经》；《论语》和《孝经》当时都认为是记录孔子言行和教诲之辞的书，因此将它们与《六经》并列，以体现对孔子和儒家的尊崇。

(二) 诸子：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的著作。其中前九家包括了先秦至西汉不同学术流派的一家之言，它们涉及到宇宙、人生、伦理、政治、逻辑和农学等不同领域，小说家是街谈巷议的杂录，于治国之道也有可观之处，故列于诸子。

(三) 诗赋：屈原、荀卿、陆贾等人的赋作和配乐歌唱的歌诗。古人把诵读的文学作品称作赋，以区别配乐的歌诗。

(四) 兵书：是军事著作，分权谋、形势、阴阳和技巧四种。

(五) 术数：包括天文、历法、占卜星相的书。

(六) 方技：主要是有关医药、养生的书。

班固撰写《汉书·艺文志》，虽说按照《七略》的六分法著录图书，也有所调补充。它对《七略》中《略》下小类有的做了合并、改变。又增加了西汉末年刘向、扬雄等人写成阶著作。《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官修史书著录图书的失例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后的《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乃至《清史稿》均设《艺文志》或《经籍志》著录一代图书。图书目录学在我国古代成了史学的一个分支。刘向、刘歆和班固将诗赋单科类，反映了两汉期间诗赋创作兴盛，致人们对诗赋的重视。其不足之处是受两汉经学和尊经观念的影响；将今天看来分属于不后门类的图书统归于“六艺”类，

以示尊经。这同时也反映了我国传统的混一思维致使图书分类不够明晰。这个局限至唐初魏征主编的《隋书·经籍志》才有明显的突破。

《隋书》是唐初所修一系列前朝史书中重要的一部，其《经籍志》尤有价值。自汉至隋，历经六百余年，其间新出许多图书，亡佚的也不少。唐初搜求历代遗书，渐具规模，需要对汉以来的图书情况做一次总结。《隋书·经籍志》叙述学术源流，考察书籍存亡，是我国古代书籍的第二次总结。它在图书分类上的重要贡献是突破了刘向、班固的六分法，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确立了古代图书的四部分类模式。尤其重要的是，它在中国图书分类学上第一次提出了“集”的概念，反映了古代图书分类思想的深入。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存在“经”、“史”、“子”等概念。直至魏晋六朝，文学创作虽日渐增多，但在图书分类上依然没有出现表明文学创作的独立概念。《隋书·经籍志》将“集部”与经、史、子并列，下分“楚辞”、“别集”、“总集”三小类，表明作者对文学创作的独立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简要地说，《隋书·经籍志》的突出贡献是确立了文学作品在图书分类上的独立地位。

自《隋书·经籍志》将古代图书明确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别之后，宋元明清的官修史书和图书目录均沿用这种分类方法著录图书。尤其以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为集大成。其后《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相继问世。于是经、史、子、集就由古代目录学术语衍化为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代名词：它们凝聚着中华民族近三千年来在各个实践领域的精神成果，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宝库。

上文谈了我国古代典籍的分类，下面简略介绍古代典籍流传和亡佚的情况。

我们已经知道，古代书籍是刻写在竹简或木板上。西晋太康二年（280）汲郡（地名）人发掘战国时魏襄王的坟墓，竟然得到了几十车竹制的书籍。1972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汉代墓穴，得4400余枚竹简，其中有《孙子兵法》、《孙臆兵法》等兵书，还有关于政治、军事、阴阳杂占等方面的书籍。这说明古代书籍最初是以刻写的方式流传的。古人用竹、木作刻写材料，刻写困难，携带不便。于是想到改用质地轻柔的绢帛。《墨子·鲁问篇》有“书于竹帛”，说明绢帛在战国时就已经成为书写材料了。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有《老子》、《战国策》等，说明战国至西汉期间写书材料是竹帛兼用的。现在通行的书籍数目名称就是因古时书写材料得名的。用竹木作材料写的书叫册；用绢帛作材料写的书叫卷，因帛书存放时是要卷起来的。古代写书的材料，到后汉时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造纸术才有了重大改进。书写材料的改进，同时也呼唤着书籍新的流传方式——雕版印书的出现。

雕版印书的方法是；先根据书稿用毛笔在纸上写为版样，然后将版样反贴粘于修治好的木板上，使版样的图文墨迹渗入木版中，擦去纸笔后，即可据本版表面的字迹刻出阳文反字，刻好后再对书版做进一步修治，然后印出校样，校正无误，即正式印刷。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本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唐代咸通九年（868）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它证明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中国。另据中唐诗人元稹在长庆四年（824）给白居易的诗写的序文，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人用白诗印本来换取茶酒。这说明公元9世纪社会上已经流传着雕版印刷的书籍。古代书籍由刻写到印刷大大推进了典籍的流传。



然而，古代典籍在流传过程中却有着惊人的散亡。《汉书·艺文志》著录图书 596 家，到了南朝萧梁期间只剩下 44 家，到了唐朝汉时图书只剩下十之三四。有人统计，唐朝的图书到宋朝也只余十之三四。可见，在封建时代书籍一天天增加，也随着一天天的亡佚。这确是中国古代典籍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的严重损失。

古代典籍在流传过程中大量的散失，重要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兵火战乱的摧毁。自秦始皇焚书之后，古代书籍遭到了多次兵火战乱的洗劫，规模较大者有西汉末年赤眉军人关，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长安，西晋末年刘渊祸乱中原，唐前期的安史之乱，北宋末年的金兵入侵中原，……每一封建王朝的兵败国破都造成了古代典籍的重大损失。二是封建统治者的扼杀。历代封建王朝建国之初，封建统治者为了表示崇尚文化，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图书纂修工作，如唐修《五经正义》，宋修《册府元龟》。其实，一套大型图书的修纂成功，都是以大量图书的消逝为代价的，如唐太宗诏令朝臣孔颖达等编《五经正义》作为经书的惟一的权威解说，因而，其他大量的经学著作也就被废除了。这可以说是对古代书籍的“无意识”损害；更有甚者是封建统治者有意识扼杀。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建立，统治者总要顾虑到前一朝代的野史、笔记、诗文中包含着有损于自己权威的内容，往往以“采访遗书”之名，行查禁销毁之实。清朝乾隆年间修纂《四库全书》，一般说来这是中国图书史上的一桩盛事。可是在其背后却隐含着对古代书籍的杀机。乾隆本人先是鼓励各地官吏对民间藏书要“加意购访”、“及时采进”，等到“采进”之后则明谕朝臣将那些有碍满清统治的“妄诞”之书“尽行销毁”。三是传统观念的排斥。中国古代是宗法制社会，普遍流行着“重道轻技”的观念，即重视、尊崇